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近代史学刊

朱英
主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
13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
13
辑

近代史学刊

朱
英
主
编

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 13 辑/朱英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97-7332-1

I. ①近…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丛刊
IV. ①K25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773 号

近代史学刊(第 13 辑)

主 编 / 朱 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赵 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332-1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刊编委会

主 编 朱 英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王 笛 美国得克萨斯 A&M 大学历史系

石川祯浩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朱 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村田雄二郎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李培德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郑成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

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渡边佑子 日本民治学院大学教养教育中心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虞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期执行编辑 魏文享

目 录

·《章开沅文集》出版笔谈·

- 《章开沅文集》：展现章开沅学问人生的皇皇大著 朱 英 / 1
- 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 罗志田 / 3
- 继往开来 扬帆远航 马小泉 / 6
- 良史巨献 人文瑰宝 何卓恩 / 10

· 东西方文化交流 ·

- 晚清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探析 徐炳三 / 15
- 中国现代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离合：
 民国基督徒耶资关系辨 许俊琳 杨卫华 / 30

· 辛亥革命史研究 ·

- 《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
 ——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 朱新屋 / 45
- 清末“暂行阁制”的制定与权力纷争 李凤凤 / 66

· 湖北地方史研究 ·

- 论汉冶萍公司与湖北官绅间之矿权交涉案 左世元 尚 平 / 84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逆产清理制度建构与运作初探	冯 兵 / 102
1922 年梁启超武汉讲演考实	李 明 / 116

· 经济社会史研究 ·

“坚社会之信用”：近代会计师与公共组织的财务监察	魏文享 / 127
中国近代移植日本金融法之考察	王红曼 / 15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联的组织演变与发展	郑成林 / 172
韦伯与经济史的理论问题 ——以《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为中心	严 鹏 / 191

· 思想文化史研究 ·

私人空间与民国上海知识群体的精神 生活建构（1927—1937）	胡悦晗 / 208
计六奇的李岩叙述与郭沫若的李岩想象	单 磊 / 227
世缘与学缘的叠合 ——论程千帆和陈寅恪的家族渊源及学术因缘	廖太燕 / 253

· 书评 ·

商会视域下的近代南昌社会 ——读张芳霖《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以清末至民国 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邹锦良 / 266
劳资政治的新解读 ——田彤教授《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 年）》 读后	张 鑫 / 270

Table of Contents	276
-------------------------	-----

稿 约	284
-----------	-----

《章开沅文集》：展现 章开沅学问人生的皇皇大著

朱 英

年届九旬的章开沅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多个重要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取得了颇受关注与好评的丰硕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士和硕士，其中不少人现今也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近代史研究学者。章开沅先生还曾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及至晚年仍不断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陈利弊，建言立说，屡有发人深省之语。

章开沅先生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已经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奠定了显著地位与影响。而这一重点学科在今后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则有待我们后辈一代又一代学人不间断地艰辛努力。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依赖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编辑出版章开沅先生的文集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早期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张謇的深入探讨到辛亥革命史研究蜚声海内外，从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倡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思想文化史与近代社会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研究，再到后期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章开沅先生涉足近代史研究诸多领域，并在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开拓者或先行者，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章开沅先生还在海内外举行过无数次学术演讲，接受了许多海内外知名报刊和电视的访谈，晚年并撰写了一些回忆性文章，所有这些文字也都收录至文集中。因此可以说，这部文集是集中展现章开沅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皇皇大著。

严昌洪教授在201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海远航——章开沅传》（刘莉著）一书中这样描述章开沅先生：他是史学家，曾将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又曾将国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他是教育家，是享誉国际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六年校长，育人无数；他是思想家，通过历史研究寻求前人智慧，对一系列攸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严昌洪教授写下的这段文字，称得上是对章开沅先生突出贡献的准确概括。

在庆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们遵从章先生本人的意愿，不进行任何祝寿活动，只是以这部章先生本人的10余卷大型文集和另一部正在编辑的纪念文集，表达研究所以及学界同仁的良好祝愿。这部文集能够出版，应该感谢具有学术传承使命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等出版社领导主动提出出版章开沅先生文集的动议，并征得了章先生同意，随即与近代史研究所多次商议相关具体事宜，最终确定了文集的编辑方案；而且不计成本，制定了装帧精美、印刷优良的高标准，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奉献一份厚礼。

这部大型文集的顺利编辑出版，也再次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章开沅先生开创与培育下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多年来，研究所全体人员除各自拥有自己的专攻研究领域之外，也形成了积极合作、共同从事重大项目研究的传统，由此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大型学术成果，受到史学界好评。这部大型文集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尤其是增补注释内容，工作量较大，单靠一二人将耗时甚久，只有研究所全体人员共同分担，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不仅如此，对文集如何分卷、各卷内容如何排列以及相关各方面一系列具体技术问题的处理，研究所全体编辑人员曾经多次开会讨论，运用集体智慧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

“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先生这一题词是勉励我们后辈学人在学术研究的艰难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

罗志田

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闻之欣喜不已。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 学年），林蔚（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后来过从渐多，课外也时常请益，真是获益良多。那时曾写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便得到先生具体的指教。受教之余，遂产生了回国后追随先生到华中师大任职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为我是说客气话（那时拟毕业后回国的确实不多），仅漫应之。后来我将毕业，先生确知我要回国，乃托曾在普大进修的陈时伟兄带信，欢迎我去华中师大。但人生缘分，有时就怪一间。陈时伟兄那时已就读华盛顿大学，恰遇他导师转校，随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带到时，已是半年以后，其时我已确定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了。

长时间追随的机会虽然失去，短期的师生之缘却一直是我珍贵的记忆。因国内多以在某师名下念过学位作为列入门墙的标准，我亦恐有辱师教，故未敢公开表出这一段师生之谊，谨在私下通信时以师相称而已。2005 年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大曾开学术研讨会庆祝，我才首次在拙文末尾略及这一渊源。开沅师此后仍诲我不倦，一直关注扶掖我的学术“成长”。前辈风范，感人至深！同时，先生的学问言说，更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每读

先生文字，或有机会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见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一个宏观的指导性意见，针对的大概是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

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都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见其大。不熟悉宋以来的历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很难认识得清楚；而清儒素重汉学，读书识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有意面对一般人立说者，也随时都在引经据典。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几乎无法了解其言说的实际所指。而近代中国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响之大，更已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发展，大大束缚了其对国事务的判断。可以说，“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的提醒。

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学人，年轻时便有报国救亡的经历，听说后来也几次有“大用”的机缘，却因常出“真言”，都擦肩而过。唯人生之阅历，总蕴含于学问之中。先生的史学，便向以识见和裁断著称；即使讨论具体史事，也都逾越所谓“就事论事”的层次，具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例如，清季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虽已有三民主义观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说，往往侧重于其中排满的民族主义一端，可说是“一民主义”。川人雷铁崖于1907年便曾说：“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段话是有些“种族主义”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时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故其“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①这就透过言说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从而点出了当时相当一批人言说的实际指向。

这还只是先生“了解之同情”取向的一个小例子，在同一文中先生更指出，在20世纪初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

^① 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非常注意利用这既存的信息网络，而上海也正是以东京为中心的留学生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口集散地。结果形成了一个传播革命舆论的“东京—上海轴心”。^①窃以为这个“轴心”或不止于传播革命舆论，当时与革命党人竞争的言说群体，大体也存在类似的“轴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转向“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无疑会促成晚清史研究较大的新突破。先生并注意到：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们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②这更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不仅适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趋新人物，也大体适用于进入民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趋新人物。中国读书人从清季开始的反传统倾向，基本都可由此视角去认识和理解。

上面只是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两篇小文中的见解，已如此振聋发聩。类似的睿见，在《章开沅文集》中必随处可见，则文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先生有一句众皆熟悉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对先生个人而言，或类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对后辈学人来说，则不啻船长的“行驶海图”。愿与文集的读者分享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彼此共同努力，在史学的瀛海中续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① 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② 章开沅：《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181页。

继往开来 扬帆远航

马小泉

朱英师兄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导师章开沅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想让我写几句话。作为章先生的及门弟子，又做了多年的出版工作，我深知“文集”出版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章先生的著作多已刊行，我也大都有过度心研读，对其学术思想有所了解，但看过《章开沅文集》选题计划书及相关材料，还是有很多新的感受。

中国向有编辑学人文集的传统，或选集，或全集，类型不同，各有所取。对于章先生的学术思想成果，以文集命名应当是贴切的。编选人文学者的文集，与编选政治人物或专业作家的文集不同。章先生的文集，重点不在钩沉辑佚、搜罗巨细，也不在版本汇校、观点订正。因为章先生是一位思想性极强的史学大师，编选文集，固然要对其学术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而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对其学术人生进行“盘点”（章先生语）。其目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面了解章先生的学术成就，更在于展现一位史学大师的人生历程、学术追求，体现他对史学前景、学术环境乃至社会发展的殷殷关切。

如何体现文集的思想价值，是编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既要考虑如何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文学者的形象，也要自觉完成一个重新学习、深度理解、科学取舍的研究过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章先生学术思想体系和学术风格所决定的，也是章先生的学术情怀和人生追求所赋予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章开沅先生是一位极具使命意识的史学家。章先生所关注的学术领域，视野宏阔，主题鲜明。他从辛亥革命研究起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社会的变迁，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学术路向。他对资产阶级和商会组织，对张謇、章太炎等重要历史人物，对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对社会环

境和江浙区域研究，对日军侵华及南京大屠杀，对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对教会大学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均有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章先生的治学轨迹，是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革为中心，紧扣历史与时代的脉搏，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文明而展开的一系列学术思考。这种学术思考，只有通过对其学术著述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阅读，才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和共鸣，这正是“文集”出版的思想意义。

正如章先生所提出的著名学术理念——“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主张史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文集”的出版，将为我们准确地理解这一理念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

章先生的这一理念，可以说在其青年时代即已确立。他由金陵大学肄业之后，投身革命事业。由于历史的机缘，进入范文澜、潘梓年等进步人士创办的中原大学。草创的中原大学曾在古都开封国立河南大学校址办学半年，随后南迁武汉。十多年前，章先生偕师母重访开封，追怀当年的人生理想和青春风华。我在开封陪同左右，聆听章先生讲述当年的激情故事，感悟他的人生抱负。他虽无缘战场杀敌，却由此走上了学问报国之路。中原大学，正是章先生学问报国的起点，这种人生阅历，也决定了章先生日后的学问走向。

其二，章开沅先生也是一位极具责任意识的教育家。他有过主政大学的亲身经历，有对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韦卓民等人的专门研究，有与世界著名大学的广泛联系与交流，更有对中国大学的成长过程与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文集”收录了很多章先生的演讲、对话、访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章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特别是他与国际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更充满了对教育乃至人类各方面问题的关怀和思考。

章先生坚持教育“育人”的基本原理，对当下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过许多理性思考和经验批判。他认为教育的根本是人格的养成，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他反对功利主义教育，批判伪科学的量化管理，抨击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和“产业化”决策；他倡导人文主义，主张学术独立，期待大学精神的重建，明确提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章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仍然义无反顾，身体力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请辞“资深教授”一职。我曾评说，这件事情看似简单，是个个体问题；实际上意义深远，是个社会问题。无论其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在当下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章先生以一位老知识分子的个人力量，勇敢地去撬动僵化的教育壁垒。这不仅是对现行学术体制的拷问，更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感召。这种独立的学人品格，令人起敬。

2015年元旦期间，我回华师看望章先生，拜访在校师友。在与章先生的交谈中，大学仍是一个重要话题。他始终关注大学的建设，强调大学必须自我完善，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并欣然为创建中的“现代大学网”题名。章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也是文集出版的价值所在。

其三，章开沅先生还是一位极具儒者风范的“铺路石”（章先生语）。他不仅治学严谨，学路宽广，而且循循善诱，激励后学。他曾谦逊地说，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缺少必要的学术高度，只能为年轻的后辈充当铺路石子。正是这种儒雅宽宏的学人风范和人格魅力，吸引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培育了中国学术界普遍看好的团队精神。

如今，在章先生所关注的每一个学术领域，都后继有人，学有所传。正如章先生的另一句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先生文集的出版，正像是史学界的集结号，定会产生继往开来、扬帆远航的指引作用。

中国学人对学术生命有着一份情怀，叫作“薪火相传”。在章先生身上，不仅体现着特有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其毕生的学术探路和思想创新，又为我们后辈学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文集比较集中地收录了章先生历年撰写的随笔、序跋。这些文字，范围广泛，文辞精美，既是对学术研究的补充，也是对后辈学人的启迪，充分反映出一位史学大师一以贯之的心路历程，这是“文集”同样需要用心安排的内容。

最后，再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文集的出版，在内容的辑选和体例的设计上，有幸得到章先生的亲自过目，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以往很多学人文集的编辑，因为缺少集

主本人的审定，而给后人留下很多钩沉、考据与辨析的任务。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文集都有类似的问题。这类问题虽然在所难免，却提醒我们，尽量不留或少留遗憾。

章先生撰写的自序也是一篇难得的妙文。无论从内容到文采，读过之后经久难忘。章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实斋”，这篇自序，正是通过朴实而真实的文字，描述了自己治史阅世的多彩人生，以及矢志不渝的学术情怀。在自序中，章先生除了追怀当年与史学前辈的谈书论学，还谈到与出版界前贤的君子交谊，这些编坛佳话，很值得今天年青一代的出版人借鉴和追慕。

另外，再提两点建议。

1. 建议每卷之前设计几张插页，将章先生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生活照片、手稿照片和书影图片插入其中，使读者不仅可以一睹章先生各个时期的风采，还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学术足迹。在涵盖内容较多的卷次，各部分之间亦应设计插页，以作类别。这些图片绝非为了补白和点缀，而是包含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鲁迅编选个人文集时，也特别注重定型（装帧形式），主动设计各种漫画、版画。这些图片，如今已成重要史料。

2. 编辑学人文集最难处理的是日记和书信。从一般意义上说，日记适合按传记、年谱之类以专集处理。但书信有别。我想，章先生肯定写有很多重要书信，有的甚或公开刊行，这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有些书信以学术思想为主题，完全可以视同于文章入集。近代很多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切磋和思想驳难的书信，实际是重要的学术题材（因未见到选题计划书中提到书信，所以想到这一问题，可能编者已有考量，本条意见当属臆说）。

总之，我很感激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师友，你们有幸承担起这份学术传承的责任，这是当代学人的幸福。我也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仁庆幸，你们近水楼台，出版章先生的文集，也是当代出版人的机缘。希望“文集”早日问世，惠及学界。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良史巨献 人文瑰宝

何卓恩

经过三年多的收集、整理和编纂，11卷本《章开沅文集》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比较完整地呈现了章开沅先生自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至荣退前的主要学术成果和社会人文论述，它的问世是史学界的盛举，也是中国甚至世界人文领域的一件大事。

整理出版名人文集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四部丛刊”的“子部”和“集部”都有大量人物文集。近代以来我国著名学人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均有开展，如《饮冰室合集》等，但在那个国困民穷的时代，成绩很有限。1949年后国家告别了外侮和内战，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左”倾，学术空气极不正常，然而尽管如此，1950—1970年代也曾出版过《龚自珍全集》等人物典籍。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著名学者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进入快速开展时期。

新时期著名学人文集的整理编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整理出一批晚清民国学人的文集，如《魏源集》《严复集》《章太炎全集》《胡适文集》《陈独秀著作集》等，涉及的人物主要是著名社会思想家；1990年代后期以来，除了继续推进近现代思想家文集的编纂，还致力于20世纪学术总结文献的出版，包括现当代学术大师的文集，数量蔚为大观，岑仲勉、陈梦家、王锺翰、黄侃、朱希祖、孟森、孙楷第、童书业、余嘉锡、陈直、唐长孺、石声汉、阴法鲁、王毓铨、何兹全、张政烺、顾颉刚、孙毓棠、陈旭麓、余英时、饶宗熙等，皆有少则数卷、多则数十卷的文集面世。章开沅先生是当代中国颇有威望、享誉国际的学者之一，著述宏丰，不少论著和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出版。这是一笔巨大的学术和思想财富，进行较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纂成系统的多卷本文献方便全国和世界学术界充分运用，是大势所趋、理之

固然。

作为半路出家的学界晚辈，我有幸成为这次文集编纂的参与者之一，在出版之前得以优先系统拜读章先生的论著，完整领略良史风采。通过系统阅读，除在历史知识和见识上受教丰厚之外，对何为良史，有了比过去更深一些的认识，其要者三。

一 良史不仅需要求真的态度，更需要求真的勇气

“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真实性历来被视为史学之魂，章先生鸿著最大的特色正在于现身说法地捍卫这个史学之魂。让历史研究客观呈现历史真实，表现史学公正，有赖于史家的德、才、学、识，章先生的渊博学养和活泼文才毋庸赘言，其研究问题的独特下下功夫和坚持真理不作违心之言的精神尤其难能珍贵。

章先生以研究辛亥革命史享誉于世，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从史学史看，辛亥革命史著的编撰几乎与辛亥革命同年发生，但长期为党派政治立场所左右；真正基于学术的严谨研究，章先生有开路之功。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章先生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创造性地用于史学研究，用史料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史学走出御用阴影起了示范作用。章先生力求平实和公正地揭示辛亥革命的发生原因、背景、过程、各种人物和组织的角色、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下下功夫最重史料的原生态和心态的纯客观，他写成的每一篇专题论文，每一本论著，皆以原始的档案和报刊文献为依据，而且研究态度上不同于以往学界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做法。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章先生已经尽其所能以求真的学术精神，写成《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论张謇的矛盾性格》等文，改革开放后以更加开放和严谨的态度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团，早期资产阶级的地域特点，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之间的复杂关系，排满思潮与20世纪初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展开的关联，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张謇等众多活跃人物及其思想与活动。这些研究改变了国内空论不实的学风，突破了意识形态禁区，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并且在国际上确立中国学界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

章先生把辛亥革命史推向了国际，也将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引进到中国，特别是中国基督教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这项研究中章先